

A series of books by the historian of philosophy



哲学史家文库

巴克莱哲学研究

傅有德 著

人民出版社

series of books by the historian of philosophy

哲学史家文库

巴克莱哲学研究

傅有德 著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夏 青

装帧设计:刘林林

版式设计:赵迎珂

责任校对:赵立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巴克莱哲学研究/傅有德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6

(哲学史家文库)

ISBN 7-01-003001-4

I. 巴…

II. 傅…

III. 巴克莱-哲学思想-研究

IV. B5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11131 号

巴克莱哲学研究

BAKELAI ZHEXUE YANJIU

傅有德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新华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9 年 6 月第 1 版 1999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张:11.125

字数:247 千字 印数:1-5,000 册

ISBN 7-01-003001-4/B·245 定价:19.60 元

序 一

陈修斋

所谓“西学东渐”，即使不算明末清初利玛窦、汤若望等西方传教士来华传播天主教的同时，带来一些主要属于西方中世纪的哲学和其他文化知识那段史实，就从 1898 年严复翻译《天演论》算起，至今也已有近百年的历史了。我不说西方文明中的其他成份，单说西方哲学传入我国，也达到了相当的规模，决不应低估我国学人研究、介绍、传播西方哲学所取得的成绩。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的半个世纪中，我国学者已译出了不少西方古典哲学名著和其他现代西方各派哲学及哲学史的著作，同时也出现了几位研究西方哲学卓有成就的专家，其中有的是有国际影响，完全可以与西方一流学者相抗衡的。新中国成立以后，这方面的成绩也是有目共睹的。在西方哲学著作的翻译、介绍方面，从总体上来看，无论在数量或质量上都大大超过了建国前的成绩。至于西方哲学专业工作人员的数量以及西方哲学在大学教育中和社会上的普及程度，都是旧中国所无可比拟的。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这方面有蓬勃的发展。这些成就都是应该得到充分肯定的。

但是，在肯定成绩的同时，也应清醒地看到我们的不足。尤其是如果我们不只是和自己的过去比，而是以当今世界先进水平为标准来衡量我们已取得的成就，那就更清楚地看到了我们的差距。

在进行比较时，以什么为标准的问题，是一个可以引起争议，也值得讨论的问题。为了提高信心，不致因自己的落后而灰心丧气，与自己的过去比以显示取得的进步，来鼓舞继续前进的斗志，是可以的，也是必要的。但决不应以此来作为安于现状的借口，连“见贤思齐”的古训也忘掉。也还有一个如何看待世界水平或世界先进水平的问题。这也是可以争论的。有人说，越有民族性的东西，就越有国际性或世界性。例如一件艺术品或一项文化成就，越表现出其浓郁的民族风格，就往往越得到国际上的承认和欣赏。一部电影也许正因为其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而获得国际上的电影大奖。这种意见在一定意义下当然是对的，我也决不否认。但能否就因此说，凡是具有鲜明民族特点的东西，也就一定具有世界先进水平呢？我认为不能。男人拖长辫子，女人缠足，这在满清时代是最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在世界上也是独有的，但是否因此就应被视为达到当时世界先进水平呢？不但本民族落后的东西不能因其具有民族特征就被视为达到世界水平，即使本民族最先进的东西，也应与其他民族同类的最先进的东西比个高下，才能断定它是否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当然这是以双方有可比性为先决条件的。也有一些是虽然可比，但只能比异同而难比高下的。这些都是另当别论的问题。）

我之所以发这番议论，用意是想提出一个问题：我们中国人研究外国哲学，对其达到的水平，应该拿什么做标准来衡量？在

这里我想引我国两位著名学者的话来表达我的意思。一位是陈康先生,他在解放前是西南联大、北京大学、中央大学哲学系的教授。解放前夕离开了大陆,后长期在美国任教和定居。陈先生是一位卓有成就的古希腊哲学专家,在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特别是两者关系方面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精通希腊文、拉丁文和英、德、法文,在学术素养上是完全可以与西方著名的希腊哲学史家并驾齐驱的。他在西南联大任教时,应贺麟先生创办的西洋哲学名著编译会之请,译注了柏拉图的《巴门尼得斯篇》。这译著的注释部分比正文字数多几倍,本身就是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研究成果。此书 1944 年作为哲学编译会主编的丛书中的一种,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81 年又在汪子嵩同志关注和协助下由该馆重印了。在该书的译著者“序”中,陈康先生写道:“现在或将来如若这个编译会里的产品也能使欧美的专门学者以不通中文为恨(这决非原则上不可能的事,成否只在人为!),甚至因此欲学习中文,那时中国人在学术方面的能力始真正的昭著于全世界;否则不外乎是往雅典去表现艺术,往斯巴达去表现悲剧,无人可与之竞争,因此也表现不出自己超过他人的特长来。”另一位是季羨林先生,他是大家所熟知的,用不着介绍。我是在《新华文摘》1990 年第 10 期上转载的《中国解读佉卢文的第一人》一文中,读到季羨林先生对青年学者林梅村初学佉卢文时的“一席教诲”。季先生说:“中国学术要发展,必须能直接与西方一流学者相抗衡。有些人在国人面前大谈希腊、罗马和苏格拉底,而在洋人面前讲《周易》,谈老庄。这不算什么本事。真真有本事,就应去和西方学者争论他们的学问,与国人讨论中国的学术……”不难看出,陈康先生和季羨林先生在这个问题上的意见是完全一致的。而他们也都是身体力行实现了自己的主张,在

自己所从事的专业上都能真正“与西方一流学者相抗衡”的，因此他们的主张也就具有十足的说服力。在陈康先生和季羨林先生面前，我作为一名西方哲学工作者，不能不以自己离他们所提出的标准还很远而感到惭愧。但我抱着“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态度，还是竭诚赞成他们的主张。我认为对这种主张应大力宣扬，使之深入人心，成为从事学术文化工作者的共同目标。也只有达到了这个目标，才算真正做到了学术文化上的现代化。

此外，我还想说，随着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世界已变得越来越“小”，确实变成一个“地球村”了。随着改革开放，我国也终于冲破了闭关自守的局面，而大步走向世界。在这样的形势下，就哲学或一般文化来讲，诚然民族、区域的特点也总仍旧存在，但从另一方面来看，随着国际交流的发展，各民族、各地域的哲学或文化也都正在融合成为全世界、全人类的财富。就这个角度说，西方哲学或文化，既是西方人的，也是东方人包括中国人的，正如中国或东方的哲学或文化，既是中国人或东方人的，也是西方人的一样。因此，中国人研究西方哲学也并非“舍己之田而耘人之田”，而是属于自己的分内之事，正如西方人研究中国哲学或文化，也应是他们的分内之事一样。这样来看时，中国学者研究西方学术也就本应该与西方学者用同样的标准，有并驾齐驱的权利和义务，也正如西方学者研究中国学术文化也应与中国学者用同一标准一样。这当然不是能一蹴而就的，但应该是人们追求的目标。

我在这里谈论这些，难免被看作是在“借题发挥”。我确是有“所感”而发。这“所感”的首先就是我国西方哲学研究工作虽说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总的来看水平不高，和世界先进水平相比差距还很大。尽管我国也有像陈康先生那样的可以“与西方一

流学者相抗衡”的专家，但为数真可说是“凤毛麟角”——太少了。我也即将满 70 岁了。比我更老一辈的专家中，还可举出几位像陈康先生那样达到世界水平的西方哲学专家，但连同和我同年龄的一辈人在内，以及以下几代的中青年西方哲学工作者，尽管其中也不乏优秀的，或很有发展前途的人才，但迄今为止我斗胆说还没有什么人在学术素养上达到能和陈康先生他们相比的程度。不说别的，单就文字工具而言，若要成为一个真正够格的（且不说是第一流的）西方哲学史专家，则希腊、拉丁、英、德、法五种文字是都须掌握，缺一不可的。这在西方并不难做到，而陈康先生也是做到了的。但我们现有的后辈西方哲学史工作者，有谁满足了这个条件呢？学术素养当然不仅限于文字工具，还涉及对广阔的相关知识的掌握，有关资料的占有和理解，以及对前人和同代的其他学者在相关问题上已取得研究成果的熟悉，等等。这些都本是从事学术工作者的常识。但早在“文革”前我有时发表一点类似的意见时，就难免因为“宣扬资产阶级学术观点”而受到批判。还有一种论调是认为我们掌握了马列主义的理论武器，而“资产阶级学者”都是以非马克思主义或反马克思主义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观点为指导的，因此他们的研究成果都必然是不科学的（主要就哲学社会科学而言），根本不能和我们相比。我也衷心认为能够正确地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以之为指导去从事学术研究，的确可以是我们的很大优势，但首先这马克思主义必须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而不是被歪曲了的假马克思主义或教条主义，也不是从马、恩、列著作中任意断章取义地摘取的片言只语乃至个别结论；其次，即使真正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原理也不能以之代替整个学术水平，正如一家工厂即使有第一流的机器设备，但若没有第一流的生产工艺或

不能运用合格的原材料,因而也不能生产出第一流的产品,不能认为已具备第一流的生产能力一样。这种在极“左”路线支配下提出的论调,今天大概已没有多少公开市场了,但也难说完全没有影响。

其所以我国西方哲学研究工作学术水平不高,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当然也有主观方面的原因。我作为西方哲学工作者队伍中的一员,就自身而言,我完全真心实意地承认自己的主观努力是很不够的。但光责备这方面的工作人员努力不够是不能解决问题,也不够公平的。因为尽管有人确实努力不够,但多数人其实还是十分刻苦用功的。但他们取得的成果往往和他们所付出的辛勤劳动不相称。其主要原因我认为还是在于极“左”思想的影响而对西方哲学的重视不够,对这项工作的意义和重要性没有足够的认识,对评价这项工作的水平所应采取的标准也缺乏明确的主张。早在 50 年代中期制定 12 年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规划时,据我所知,西方哲学就没有被列入重点项目,其理由据说是这方面只要向“苏联老大哥”学习,把他们的研究成果吸收过来就可以了,用不着自己花多大气力去研究;我们只要搞自己的中国哲学就够了。对这种意见,虽然当时就有许多西方哲学工作者提出了异议,但事实上并没有影响到实际工作的安排。在较长时期极“左”思潮的影响下,西方哲学常常被看作是属于“封、资、修”的“货色”而受到排斥、蔑视或打击。许多西方哲学工作者受到摧残和歧视。这些情况中年以上的人都记忆犹新,用不着多说的。直到改革开放路线逐步贯彻,这种情况才逐步有了改变。尽管道路依然是曲折的,但西方哲学工作在中国得到应有发展的日子终于随着改革开放而来到了,并且相信还会随着改革开放路线的进一步贯彻而更加发展、繁荣起来。我们

也相信,随着这种形势的发展,必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走上追求世界先进学术水平的道路,陈康先生、季羨林先生以及其他一些有类似胸襟和主张的学术文化界人士所提出的中国学术界应“与西方一流学者相抗衡”,甚至应力争超过他们的号召必能得到越来越多人的响应,这目标也定会逐步得到实现。

我之所以对此表示乐观,也并非只是盲目地基于一种美好愿望,而是有一些很好的例证表明这种愿望是有根据的。我眼前放着的这部书稿,山东大学哲学系傅有德同志的《巴克莱哲学研究》这部力作,就是一个好例。

说起巴克莱这个名字(特别是不合“名从主人”的原则,多半是照俄语音译过来而较为人所习用的“贝克莱”),在我国倒是并不陌生的。不仅西方哲学史工作者熟悉,学过一些马列主义哲学原理和经典著作的人也都耳熟能详,在绝大多数人心目中,他无非是“主观唯心主义的老祖宗”,荒谬至极的“唯我论”的主要代表,是哲学上的“反动派”。人们的这种印象,主要是从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特别是其“代绪论”,以及以此为据的各种教材或文章中得来的。应该指出,列宁这部名著的目的,主要是在揭露当时俄共(布)党内的论敌波格丹诺夫等人要以马赫主义之类的哲学来修正马克思主义的企图,指出他们的这种观点是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即辩证的和历史的唯物主义相对立的主观唯心主义,其思想渊源可追溯到巴克莱。就列宁的目标来说,这就完全够了。他并不是要作为哲学史家来对巴克莱的哲学作全面的介绍和评价。他也没有义务或必要来这样做。当然,就一般学习马列主义哲学或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人来说,也许了解到这一步也就够了。虽然这种了解也是难免有不够全面之嫌的。问题是在我国解放以来的西方哲学史工作,对于巴克

莱哲学的认识和评价,也长期仅只囿于上述论断,仿佛只要稍越雷池一步,就会背离了列宁的教导。这责任当然不能强加到列宁身上,因为他并没有说他对巴克莱哲学的论述就是对他的全面评价,也没有要后来的哲学史工作者对巴克莱哲学的论断只能以他在某书中的观点为惟一依据。而我们过去在西方哲学史作品中对巴克莱哲学的介绍和评价,基本上是只把它作为彻头彻尾的主观唯心主义谬论而全盘否定的。这主要是从日丹诺夫在《西欧哲学史》讨论会上的发言精神支配下的当时的苏联哲学史作品中搬来的。在当时似乎也非如此不可。我至今也不认为应该全盘否定那时在“向苏联学习”口号支配下所做的西方哲学工作。我也是这一工作的参加者之一。那毕竟是打下了我们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事西方哲学史教学和研究工作的基础的。其基本内容我认为也大都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则和历史真相,决非一无是处。而且我们也并非全盘照搬苏联作品,而是根据哲学家的原著作了补充和订正的。但无可讳言,其流弊和缺点也是明显的。主要弊病就是在所谓“坚持哲学的党性原则”思想支配下的简单化和片面性。往往一个哲学家被判定为唯心主义者就作为“反动派”加以全盘否定,而对唯物主义者则就尽量加以拔高。这类例证当然很多,而对巴克莱的态度则是最明显的例证之一。

这种状况也并非“一帆风顺”。有些人也做过一些抵制或抗争。但这种人往往因此在政治风浪中受到打击,以致终于达到都同唱一个调子的地步。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路线的逐步实施,这种局面才终于逐渐被打破。在西方哲学领域内,不仅出版了许多新译的作品和在报刊上发表了许多论文,而且出版了不少研究专著,其中不乏很有

独立见解并表现出相当学术功力的作品。就巴克莱研究而言，也出现了若干论文和专著，提出了一些与上述解放以来的传统见解不同的观点和论断。例如复旦大学的阎吉达同志在《巴克莱思想新探》一书中，就强调巴克莱的思想，并非一成不变，而是有其形成和变化的过程，并认为巴克莱的思想“在世界观上，从主观唯心主义趋向二元论；在认识论上，从经验论转向唯理论”。这就冲破了对巴克莱哲学的传统看法，引起人们对它的进一步思考，对巴克莱哲学的研究，自有其促进作用，是很有意义的。别的一些论文也提出了不少新见解。但总的来说，对巴克莱哲学的研究，比起有些哲学家来相对地较少，应该说还是很薄弱的，与我们以上所提出的目标来比，自然还有很长距离要走。而现在傅有德同志的这一著作，我认为是向上述目标迈进的又一步，是可喜的、坚实有力的一大步。

傅有德同志近年曾有机会去爱尔兰巴克莱的母校都柏林三一学院进修，这里是公认的国际巴克莱研究中心，傅有德同志因此不仅能接触到有关巴克莱的全面系统的资料，而且也有机会与当今著名的巴克莱研究专家结识，得到他们的亲自指点和帮助。这就使他有了“入虎穴、得虎子”的便利条件。而傅有德同志确实没有辜负这难得的好机会，果然得了“虎子”回来了。他回国后不久就写出了这一巴克莱哲学研究专著，不仅使我国巴克莱研究的原先较落后的状况大为改观，在我国整个西方哲学研究工作中也是一项很有分量的成果。

在本书中，作者不仅对我国巴克莱研究的历史和现状，作了虽简明扼要却也相当全面的概括，这表明本书是在批判地考察和总结国内有关的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写成的。但它又绝不是旁人的已有成果的总结，而是以自己的研究大大地丰富和提高了

已有成果,使之上了一个新台阶。

更有意义的是,本书不仅考察总结了国内的已有成果,而且更加系统全面地介绍了国外一个时期以来特别是最近的巴克莱哲学研究的状况,列举了许多著名的巴克莱研究专家和权威学者的名字和他们的代表作品,也扼要地介绍了他们的主要观点和突出成就,并对他们的得失作出了自己的评论,对像卢斯那样的权威学者也在充分肯定其成就的同时指出其不足;对其他学者的观点更大胆地作出了评论,肯定其正确的方面,批评其错误或缺点。我之所以说本书标志着向“与西方一流学者相抗衡”的目标“迈进了可喜的、坚实有力的一大步”,其根据正在此。我国的西方哲学史研究作品,虽也确有学术水平相当高的,但即使这样的作品,也很少与国外有关学者直接交锋。傅有德同志的这一作品在这方面也使人感到面目一新。

本书在巴克莱研究乃至整个西方哲学研究方面之所以值得重视,更重要的还在于它对巴克莱哲学的本质或主要倾向,提出了很新颖的见解,对这方面的传统观点提出了挑战。本书把巴克莱的哲学称之为“非物质主义”,并认为“其主要倾向是客观唯心主义的”,“可以说是一种客观唯心主义的现象论”,而不是传统观念所认为的“主观唯心主义”,更不是“唯我论”。当然,本书所提出的这种主张是可以争论的。我决无意认为本书的论述已一劳永逸地最终解决了关于巴克莱哲学的“主导倾向”或“本质”问题,今后大家都必须接受它作为普遍同意的结论。对真正的哲学问题,是不可能有这样的结论的。对一位哲学家的哲学体系及重要观点的理解和把握,总是涉及一些根本性的哲学问题,因此也是难以获得普遍共识的。本书介绍的西方研究巴克莱的各专家之间,对此问题也就意见不一。应该说,我国近年来对巴

克莱哲学的主要倾向或本质的看法,也表现出各种各样,本书引论中对此也作了介绍。而本书所提出的观点,也并非全属作者首创的全新论断,是吸收了其他学者的看法加以提炼而成的。重要之点在于作者不是简单地提出乃至袭用旁人的一个论断,而是对此作了比较详尽的、较有说服力的论证,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这就不仅在西方哲学史研究成果宝库中增加了一件珍品,而且使人不管对此观点赞同与否都须对其论断及论据加以重视,从而对巴克莱哲学的本质作进一步的思考,这对推进巴克莱哲学的研究自然有其重要意义。

本书的成就也不仅在于对巴克莱哲学的主导倾向提出了自己的新见解并作了较有说服力的论证,还在于它对巴克莱哲学的全部内容,从横的系统结构和纵的发展过程两方面作了较全面完整的、也较深入细致的、条理清晰的评介。除了较详细的也有较丰富新内容的对巴克莱生平的介绍之外,对巴克莱的哲学,抓住其几个主要的方面,如“非物质主义的形成及其思想渊源”、“新原理”、“观念论”、“驳物质论”、“精神实体论”、“自然哲学”、“反抽象论”等,分章作了既有丰富材料又有鲜明观点的论述;既对其内容作了实事求是的介绍,又对其得失努力作出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评价;既一反过去在极“左”思潮影响下对巴克莱哲学一棍子打死、全盘否定的简单粗暴做法,对巴克莱哲学中的合理成份和对人类思想有促进作用的方面大胆作了肯定,也对其哲学的错误方面作了应有的批判。在这全面系统的评介中,也是新意迭见。这些因原书俱在,这里不一一论列。总之,这是一部既对初学者较全面地了解巴克莱哲学很有帮助,也对研究西方哲学史的专门家很有启发的可说是“雅俗共赏”、“深入浅出”的优秀力作。

最后但决非最不重要的一点是，本书作者是努力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来指导自己的研究工作的。以上已指出作者努力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对巴克莱本人以及巴克莱研究家的观点作了评价和批判。如指出西方巴克莱哲学研究者一般都缺乏历史观点，作者就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对之作出了切中要害的批评。诚然，本书并没有引用很多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的词句，也“没有拘泥于马克思或列宁对巴克莱哲学的实质的个别结论”，而是从全面掌握和正确理解史料入手，认真、仔细地剖析巴克莱哲学的一些关键问题和概念，得出了自己对巴克莱哲学的基本性质的新论断。我认为这种态度正是摆脱了寻章摘句的教条主义习气，回复到马克思主义的正确原则或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表现。

当然，要真正能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来解决哲学史研究中的具体问题，哪怕是其中的一个问题，也都要付出艰巨的劳动，是很不容易的。本书在这方面是否实际上已做得很好，这是可以讨论的。但作者的基本态度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应该肯定的。

正如世界上不可能有十全十美的事物一样，本书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不足，作者在“引论”中对此已做了说明，我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傅有德同志和我本不认识，后来因作为同行一起参加过几次有关西方哲学史的学术会议，他又曾表示过想报考我的博士生，因此有了些接触，并给了我好学上进的良好印象。后来知道他有机会出国进修了，我也为他庆幸。初未料到 he 进修回国不久，就能写出这样一本很有分量的学术专著。他先将书稿“引论”部分寄给我，向我征求意见，并问我能否为之写一序言。我

一看“引论”，就为他广泛掌握国外巴克莱研究的状况及提出对巴克莱哲学实质的新见解所吸引，表示愿意答应他的要求，同时想先看看他的全部书稿，他也就把全稿寄给了我。我仔细地读完了全书，感到确是我国近年来在西方哲学史领域中很有价值的一个新成果，也正是改革开放路线的一个新收获。若不是改革开放路线使傅有德同志能去巴克莱母校进修，我想是决写不出这样一部作品的。这作品同时也引发我的许多感想，我很想有机会谈谈这些看法，于是就把它都写了下来，并以此作为本书写的序言。这些感想未必都与本书有直接关系，但确是读了本书原稿后在我心中引发的感想。有些本是在心中酝酿了多年的，但这毕竟是为他人著作写序，因此有些想法也只是提及而未能发挥。其中必有许多不当或错误之处，也望傅有德同志本人和其他同行师友及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1990年12月于武汉大学

序 二

谭鑫田

傅有德同志的《巴克莱哲学研究》一书就要与读者见面了。我国西方哲学研究领域又增添了一部字数虽然不算很多,但在内容上很有分量的专著。

应作者之邀,我曾两次细心阅读过这部著作的书稿。作者的目当然是让我提意见,我也尽量满足作者的这一要求。但是,读过之后,给我的总感觉是令人耳目一新,使人开阔眼界。我从中也学到不少的东西,受到很大的启发。“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我为作者能写出这样的著作而感到庆幸。

我觉得这部书之所以令人耳目一新,是由于它没有重谈大家在巴克莱的研究和教学中重复了几十年的那几句套话,而是对巴克莱哲学进行了新探索和再评价。学术研究就应该这样,只有不断提出新见解,不同观点相互争鸣,才会有生气,也才会有发展。相反地,如果大家都在重复一种观点,就会成为死水一潭。我们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几乎同声地肯定巴克莱是一位主观唯心主义者和唯我论者,很少听到不同的声音。改革开放以来,人们开始提出了一些新观点。傅有德同志正是在改革开放